

1526/.107

H24

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

郝 雨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郝雨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6

ISBN 7-81058-449-9

I. 中... II. 郝... III. ①现代文化-文化史-研究-中国②五·四运动(1919)-研究 IV. K261.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367 号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 字数 227 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50

定价：18.00 元

序 一

我在几天前去河北大学讲学时，竟于坐满了莘莘学子的教室里跟郝雨教授重逢。记得是将近20年前于外地讲学时，他也正坐在课堂中间跟我邂逅，不过当时他正值负笈求学的青春年华，真是韶光易逝，刹那间却已成为造诣颇深的专家了，在欢欣与庆贺之余也确实感到自己已经垂垂老矣，得更认真地向郝雨教授这样年轻有为的朋友们学习，时刻都应该充满蓬勃的朝气，才不至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当天傍晚，郝雨教授携带着他新著的论稿《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前来我借宿的地方叙谈，嘱我撰写一篇简短的序言。他十分悲痛地诉说着与自己相伴多年的爱妻，在替他草创的初稿紧张地打字和印刷时，竟因心脏病突发而倏然去世，所以这部手稿只印出了前五章，后面的四章还依旧保存在电脑中间，迄今都未能取出。听着他这番哀切的话语，我禁不住在心里叮咛自己，得认真地写出一些自己的意见来，作为对他的安慰和鼓励，尽管我对于传播学这个领域是相当陌生的。

郝雨教授在此书的绪论中间，很扼要地阐述了“文化是社会的生命，而传播又是文化的生命”，以及“传播对于社会具有凝聚作用”这样的道理，然后就从传播学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

现出来的种种思想主张。他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对于像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这些杰出的先驱者,都有精辟和独特的论述。正是因为调换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进行操作,他就得出了这些新颖的结论,并且有可能触发我们也去思索一些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见解。启发人们另辟蹊径地去思考崭新的天地,这正是治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我觉得所有值得传播的文化,总会具有一种美好和深刻的内涵,能够鼓舞人们向着高尚的精神境界升华。对于这种文化的传播过程,自然也是应该讲究用巧妙的方法去进行。因为如果缺乏这种完美的技巧,就无法被更多的人们所心悦诚服地接受。在传播过程中的简单粗糙或强迫命令,矫揉造作或故作高深,都会对想要传播的具有价值的内涵,造成极大的损害。而这种严重的失误,恰巧是为某种不健康的文化所进行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此种历史的教训是值得很好注意的。

鲁迅曾经说过一句很值得我们思索的话:“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热风·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整个传播过程在实质上正是一种心心相印和相互反馈的对话,除开上面所说的掌握应有的技巧之外,传者和受者这双方的文化思想素质都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当然对传者的要求必须更为严格得多,否则就无法提高受者的水准。在传播过程中应该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素质,否则就无法正常地展开工作,而传播的终极目的又是在于进一步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郝雨教授撰写此书的强烈动机也正在于此。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工作,最终是着眼于冲破和澄清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对于整个民族的蹂躏和禁锢中,所造成的缺乏主动和独创精神的奴性主义习性,而代之以平等和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这个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运

动,它的序幕其实是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打开,除了郝雨教授论及的梁启超之外,严复无疑也是一位启蒙主义的大师,他所撰写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主客平议》、《辟韩》这些篇章,都激烈地批评专制,号召平等,在近代思想史上产生过披荆斩棘的作用。100多年来这些志士仁人们异常艰巨的启蒙工作,自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收效,不过我们仍需继续前进,只有这样,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们,才可能替人类作出更为巨大的贡献。我多么希望郝雨教授化悲痛为强大的力量,坚持不懈地为这迷人的事业而继续奋斗。

林 非

1997年5月28日于北京安贞桥边

林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序 二

我和亦民兄相识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知道他是一位勤奋的学者,著述颇丰。他常常以那不起眼的几百几千精心“雕刻”的小文字发表有见地的观点,虽未对我有多大的触动,但却是我很少为之,又很难为之的。没想到,我们现在成了同室操“教”的同行,对他的了解就更多了。原来他也常有大篇幅的文字发表,只是他常在现当代文学研究舞台上“谈笑风生”,而我孤陋寡闻罢了。摆在我面前这本《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书稿就是例证。

传播学是涵盖很广的交叉学科。自然是传播的自然,世界是传播的世界,人是传播的动物。有传播的地方,就有值得研究的传播问题,就有关于传播的学问。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的变化和变化的规律,研究人类对自然的把握。人文学家感兴趣的是人的传播行为。人的生活和人为了生活的生活,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人文科学家,都不能离开研究对象,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历史与未来,历史是传承下来的,明天是今天传承的结果。研究传承的规律就是传播学的目标。谁能离开传播呢?!

研究传播和传播的学问被关注与重视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以我

们中华民族为例,五千年的文明,两千年的书面文字传播,一千多年的印刷媒体传播,近两百年的近代报刊传播,八十年广播传播,近五十年的电视传播,近十年的网络传播,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今天的社会是传播的社会,社会靠传播维系。我们不敢想像,如果没有传播,如果没有人际交流和沟通,社会将是如何的情景。

研究传播有不同的入口。当年美国的传播学大师就是从不同学术入口研究传播学的,为传播学的学术发展,为传播学学科地位的奠定作出了贡献。由于传播学是交叉学科,就欢迎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野和路径来研究传播学。亦民教授用传播学的一些理论研究现代文化的传播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范式。文化作为传播的活动,既有文化发生学的规律,也有文化传播学的规律,是人类的文化行为,也是人类的传播行为。研究文化传播的现象和规律,总结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文化与传播是互动的。没有文化不传播,没有传播不具文化意义。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是传播存在的基础。亦民教授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站在中国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极具穿透性地阐述五四新文化这一极其光辉的阶段,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为目的,以建立一套社会主流文化系统和态势为目标的思想文化活动”。他突出地强调了文化传播的功利性和主观性,强调了文化传播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代表着时代文化的根本方向”。当然,传播也有非功利性的一面。

我很羡慕亦民兄的学术精神。他要我为他的新作写序,使我能早于他人读到他的作品,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让我先受益,便写了以上的文字,爰充为序,以求教亦民兄及各位读者。

戴元光

2002年1月15日于沪上

目 录

序 一	林 非
序 二	戴元光
绪 论	1
第一章 20 世纪之初的开拓者与播种者	
——梁启超的文化传播思想与实践	13
一、“通故智”与“群心智”:对传播的价值与意义的深刻 认识与理论阐释	14
二、在传播各个环节上的独特理论建树与实践上的开拓	17
三、“舆论界之骄子”与终难超越的历史障碍	24
第二章 陈独秀及《新青年》在新文化传播中的历史贡献	
一、在社会历史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最高契合点上	31
二、传播思想的确立、升华与实践之效果	35
三、对传播内容(信息)与传播对象(受众)的准确把握与定位	40
第三章 胡适在新文化传播实践上的革命性及其传播	
思想的保守性	47
一、“暴得大名”:传播者、媒介与效果之相辅相成的变量关系	48
二、白话文倡导的传播学意义:从工具改造到信源革命	53
三、“一点一滴的改造”:胡适传播思想的保守性与消极性	59

第四章 立于时代思想之巅的呐喊与战斗

- 鲁迅的传播思想体系与实践 64
- 一、对封建文化传播体系的最早怀疑及反叛 65
- 二、文艺传播：“疗救国民精神”的最佳选择 67
- 三、对于新文化传播基质与方向的根本确立和标定 74
- 四、战斗的风格和一往无前的姿态 78
- 五、鲁迅传播学思想中的受众意识和观念 84
- 六、《狂人日记》的叙事策略及整体叙事革命意义 95

第五章 立于时代情感之巅的放号与燃烧

- 郭沫若及创造社的文化传播意义 103
- 一、“火山喷发”式的情感冲击效应 104
- 二、“气吞宇宙”般的自我意识和个性精神 116
- 三、“创造”——新文化精神在行动意义上的延伸与升华 122
- 四、“为艺术而艺术”：独树一帜的艺术创造与传播主张 128
- 五、向“革命文学”转变的必然及其意义 138

第六章 在文化传播的各个领域和岗位上

- 几位著名的文学家、编辑家、出版家及教育家的
重要贡献及传播学意义 143
- 一、沈雁冰：杰出的“把关人”与文艺传播理论家 144
- 二、叶圣陶：对新文艺、新教育的传播探索与开拓 158
- 三、邵飘萍：记者、报人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传播的大潮中 170
- 四、孙伏园：在报纸副刊的传播战线上 177
- 五、高长虹：五四大潮后期一个传播失败者的典型 182

第七章 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传播 204

- 一、蔡元培：新文化运动与传播的培植者和保护神 205
- 二、《新潮》：新文化传播中“青年进军的旗帜” 220
- 三、五四运动：新文化传播全面发展和深入的转折点与动力源 227

第八章 五四时期西方文化的引入与传播	232
一、难以阻断的“优势扩散”	233
二、异质契合中的艰难选择	238
三、西方文化传播的方式与渠道	248
四、未完成的过程	252
第九章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56
一、李大钊：高举马克思主义传播旗帜的第一人	257
二、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	261
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和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的 形成	266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文化传播点燃起的民族解放和社会 主义革命的火种	270
后 记	272

绪 论

—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才从美国建立起来,50 年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至今,这一学科在理论方面的建设可以说已相当可观,包括各个传播门类的分类传播学理论,如艺术传播学、教育传播学、政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等等。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70 年代末才开始译介,但近二十几年来,也有多部传播学理论专著和教材出版。可是,对于传播史的专门研究,尤其是关于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就国内外学术界来看,直至目前也尚不多见。有些传播学论著中关于传播史的研究,也主要是着眼于传播符号、传播媒介、传播模式,以及其他可操作性传播行为的发展与演变状况。而且,以往的这些传播学研究也大多着眼于“大众传播”。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多少年来,“大众传播”甚至成了“传播学”的理论核心和“主能指”,甚至成了“传播”的代名词,这实在是概念的混淆。宋林飞先生于 1994 年 12 月出版的《社会传播学》一书中指出:“‘传播学’这一概念,通常被当作‘大众传播学’的简称与同义词使用。近 100 年来,现代传播媒介层出不穷,大众传播吸引了人们足够的注意力。因而,打出‘传播研究’旗帜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大众传播方面。这样的‘传播研究’是片面的。现代社会的传播不仅仅指大众传播,还包括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而只是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的延

伸而已。因此,我们认为,‘传播学’只能作为社会传播的简称或同义词使用。”宋先生对以“大众传播”指代“传播学”之片面性的指责是极有眼力的,但他又试图把“传播学”作为“社会传播学”的简称,这也许就同时忽略了:一旦“传播学”可以完全指代“社会传播学”,与“社会传播学”在内涵上可以完全等同,那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另外建立一套“社会传播学”了。无论如何,“传播学”只能作为各个门类传播学的总称,而不能专门去指代任何一个单独门类的传播研究。它是一个大的学科理论研究的总系统,而各个门类的传播学都只能是在它的系统之内的子系统。这种总体与分支的关系是根本无法取代和僭越的。至于在本著中所要谈论的“文化传播”,也首先是一个特指的概念,同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它也只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当然,对于“文化传播”这一概念,以往的研究中也已有过多种解释,甚至也曾出版过一些颇成体系的理论专著,但是,就现有的关于“文化传播”概念的解释来看,一般只是将其理解为文化教育、文化渗透,还有所谓“资讯蓄积”以及社会的文化继传等。^①这样的解释与有著中的“文化传播”的概念使用也并不完全相合。从广义上看,任何传播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行为,也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而我们这里所要专门研究的“文化传播”,首先,它并不是指那种无所不包的大“文化”概念下的全部人类传播活动;其次,它也不是以上所说的那种单纯的“文化教育”一类的相对程序化的一般的和通常的文化普及与文化继传活动。在有著中,“文化传播”主要是指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为目的,以建立一套社会主流文化系统和态势为目标的 思想文化传播活动。它一般是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社会协作性的。它往往需要有一批具有时代先锋意义的思想家作为旗手或领袖,他们所传播的思想观念也必须是代表着时代文化的根本方向的。也就是说,文化传播注重的是思想和观念的社会化传播,而不只是某

^① 参见朱增朴著:《文化传播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6月。

些单纯的“观点”、“意见”和“看法”的传达。这样的传播也大都具有相当的规模性和广泛性,占有着社会文化的重要的传媒和机构。至于那些过于实用的和纯粹娱乐化以及日常化、人际化的传播,一般不在我们的“文化传播”的研究范畴。

其次,本著的“文化传播”研究又不只是纯粹的和专门的学科理论研究,不是意在一般的“文化传播”体系的建构,而是一种传播史研究,是专门择取传播史中的一段,而作为文化传播史研究的一次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文化传播史上,五四新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极其光辉的阶段,也是最能体现以上我们关于“文化传播”概念的理论阐释的。因而,本著就是从这样的理论眼光出发,集中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与传播史的整体研究。

二

我认为,文化传播活动绝不仅仅是某种个人行为或某些个人意志的结果。文化传播当然不同于日常的信息传播,它除了如传播主义的美国学派的威斯勒所说的自然传播形式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有意识、有计划地拓殖与延传。^①文化的传播一般总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运行相匹配、相协调、相交织的,并为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但它又必须通过个人行为与活动来实现与体现,最终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本质构成与必然过程。一定文化的积累和运演往往会在某一文化自身生成一种新质或新的“特色”(威斯勒语),而这种新质与“特色”如果符合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规律便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从而进一步发展演化成一种“高峰”态、“凸起”状或超前性。这样的一些态势,显然就打破了原有文化整体的相对的稳定与均衡。其“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业已超出的四围地

^① 参见沙莲香主编:《传播学》第二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带扩散与流布。那么,这种扩散与流动的过程,当然就是传播。^①那些可称之为“信源”的“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有时可显现为某一社会区域的超常发展,有时也可仅仅显现为某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创造力的非凡。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不断的高峰突现与平衡传布,才有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没有传播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传播对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传播首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方式,人与人之间正是通过各种方式的传播才实现其社会化的。没有传播,也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不可能将社会上的无数个体凝结为一体。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传播对于社会具有凝聚作用。而传播也是人类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也就是说文化是通过传播而显示其存在的,或者说只有传播,文化才能得以存在。很难设想,一种“文化”可以不进入传播,不加以交流而能够完全与世隔绝地孤立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传播又成了整个社会中流通的血脉。可以说,文化是社会的生命,而传播又是文化的生命。只有在不断地传播之中,文化才能显示其意义、实现其价值,社会也才能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对于某一传体文化来说,一旦中断传播,该传体文化必然立即被窒息乃至完全消灭,社会进程也将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阻碍甚至向后倒退。正是在不断地流动传播之中,文化才能发生融合功能、增殖功能、积淀功能、分层功能乃至最终实现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才能构成生生不息的文化发展的壮阔的历史。根据上述原理,我们是否可以进而延伸出

① 威斯勒认为,文化构成的最小单位是“文化特色”,若干文化特色进而构成了“文化复合”。文化复合会像石头投入水中那样形成波纹,以发源地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这样的对于文化传播基本过程的描述,笔者以为是否可简化为如下的一个公式:“特色”→“复合”→“传播”。那么,这其中的“复合”达到一定程度,也就形成了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高峰”态或“凸起”状。而这种“高峰”态或“凸起”状的迅速传播流布,也就又类同于传统传播学中所说的“优势扩散原理”。

这样一种判断和结论,即:一种文化的活力与生机,大致取决于其传播的速率与频率。其速率越高,频率越快,受传面越广,当然其活力也就越大。那么,这时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繁荣,也就会得到直接的推动。反之,传播的速率十分缓慢,又缺乏足够的冲击力、融合力,这样的文化显然也就在走向衰亡,这时的社会也就会因之而出现停滞。一般来说,传播的基本趋向包括纵向继传和横向互传。纵向继传更多的是延续传统,保持某种文化的既定特性,或只是将某些规范代代相袭;横向互传则更有利于不同质传体文化间的相互吸纳、相互交流,并可能在吸纳与融汇中产生新质或新的形态,实现不断地自我更新。对于任何一种整体文化来说,自我更新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在飞速发展的现代世界,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和继续传播的生机,就自然会被抛弃、被淘汰,最终走向僵死。一种长久延续的单一纵向的继传文化,如果一向处于封闭内向的状态,排斥和拒绝横向吸纳,而且尤其是被无形之中置于神圣不可变易的地位,那它也就很容易由于过于古老而失去适应新时代的生机。中国传统文化到了19世纪中期,就已经走到了这样的边缘。它不仅完全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完全失去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自我保存的能力。缓慢而落后的自然延续下来的东西,只剩下一些僵死的规范,束缚着人的精神,甚至导演着吃人的惨剧。这就表明不同性质的文化传播必然会产生绝然不同的社会历史效果。因而,对人类文化传播史的研究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并且具有极其广阔的前景。这种传播史研究可有国别史、断代史、传播通史、分类传播史以及传播人物史等多种结构框架。本著就是从史的角度,以史的眼光,重点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化传播的作用、意义和途径等,尤其注重研究当时的一些文化先驱们的传播思想、理论主张以及各自在传播实践中的巨大贡献,并从中总结提炼一些具有理论建设意义的内涵与观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文化革命运动和

思想解放运动,它被称作中国历史上三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一。它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性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与文化的世纪。而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实践方式就是对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文化意识等的广泛传播。这也是我国文化传播史上最活跃、最激动的一个时期。一批最先觉醒起来的文化人,通过办报刊、办社团、办教育、兴文艺等各种类型的现代传播手段,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启蒙—革命构成了五四时期的基本的时代主题和传播信源。

中国的以封建性为核心和主体的传统文化精神,到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整体性危机,尤其是受到世界性的现代文化精神的全面挑战,因而,中国文化各领域、各层面的话语构造及符号系统,也都从根本上发生着动摇、断裂、崩溃、重组和转型。一时代、一性质或一类型的文化精神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话语构造与符号系统来加以承载、传达和体现。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发端的白话文运动,所变革的也就不仅仅是书面话语的运作方式和某些简单的外在规则,而是体现了中国文化话语精神的最深层的变革。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负载物和赖以存在、传播、运行的符号和代码进行了最根本的颠覆。五四新文化的传播,也就开端于这种最根本的文化变革。

三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过程等。但在时段上由于文化传播往往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延展性,所以,在研究的时间起点上我们将其定在了梁启超的改良派思想的传播时期,而且,梁启超的文化传播思想与实践,也的确与五四新文化传播有着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甚至也可以说,梁启超的传播思想是最早具有自觉意义的现代传播学思想的真正发端。而对

于五四新文化传播后期的发展,又从时段的覆盖上稍稍作了一定的延伸,但其最中心的部分就是从《新青年》的创办到20年代中期的新文化运动状况。我们将从中提取十几位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新文化的传播家和活动家,深入系统地研究他们的传播思想与具体实践。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人,他们中有文学家、有教育家、有政治家、有编辑家、有新闻出版家,有的还一身兼及几“家”。他们的职业、特长和掌握的传媒,几乎涵盖了全部文化传播领域,使他们能够在许多领域成为新文化传播的旗手、领袖和主力军。在当时,他们中有的已经开始产生了非常自觉的传播学思想与理论主张。如鲁迅,从对传播意义的认识到对各种媒介的运用和操作,都有了极其完整的一套主张;还有叶圣陶,对于中小学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以及对于新文学的全方位探索等,对现代传播学的丰富和完善有着许多富于启示意义的内容。此外,本研究还对新文化传播的各个领域以及其全部过程进行了整体性的宏观把握与观照,以尽量看取其整体的传播史意义。当然,新文化运动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次最深刻、最广泛、最大规模的文化传播运动,其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各家传播思想的形成与成熟也是经历了一定的过程的。这些经过非常复杂,如胡适在传播实践与传播思想上的矛盾;梁启超的多渠道传播构想与难于跨越的历史局限;蔡元培在新文化传播中的实际影响与地位;郭沫若传播思想在前后期的严重对立等。对于这些复杂的现象,在研究中也都将尽量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如何将新兴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科学地运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之中,既不简单地照搬和套用术语,又能在研究中升华和丰富传播学理论,从而使二者能够珠联璧合,相辅相成,这实在是具有很大难度的。不过,我想这种研究一旦达到了一个完全融汇契合的境界,必将开辟传播研究的一个崭新的领域并达到一种不同寻常的高度。在文化传播史的研究上,也许会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一次有效的实验。当然,笔者本人对于传播学以及文化史的研究毕竟还是刚刚